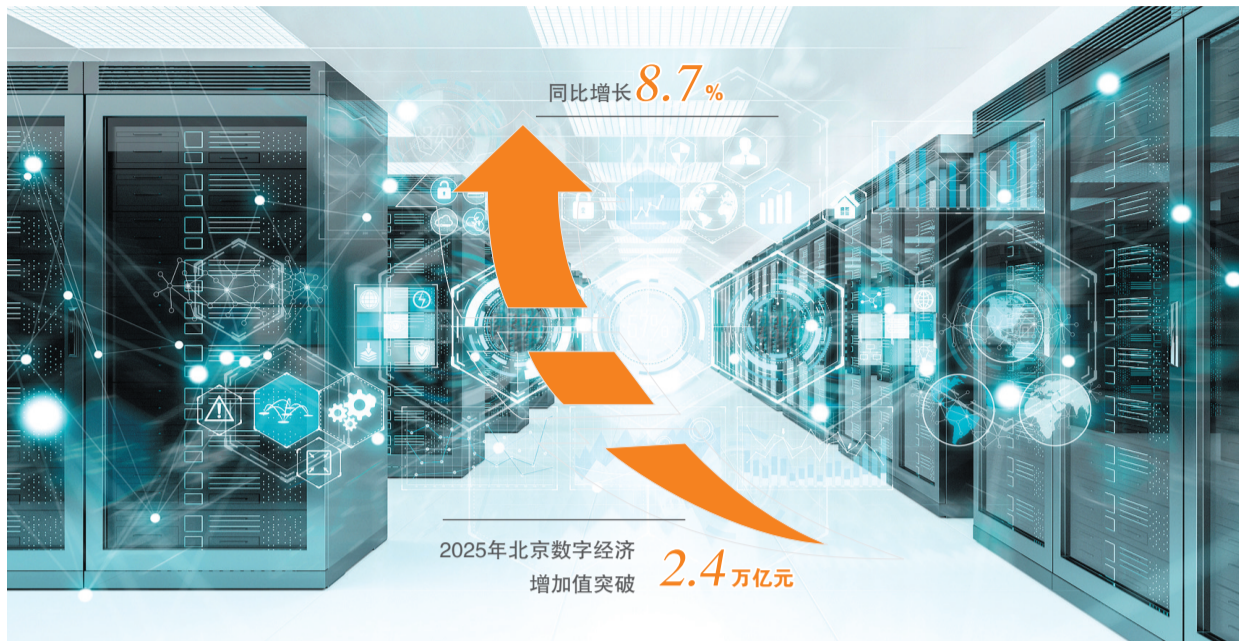


会员超200个 全球首个数据组织落地北京

3月30日,世界数据组织(World Data Organization)在北京完成组建并正式投入运行。据央视新闻消息,这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世界数据组织已吸纳超200个机构成为会员,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在业内看来,世界数据组织的成立,是中国从数据大国迈向数据治理强国的里程碑,中国从规则追随者升级为共同制定者与引领者。世界数据组织选择将总部设在北京,也将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注入新动能,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带来多重战略机遇。未来,北京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的资源和平台,可实现政策标准的国际对接、数据交易平台的国际化升级,以及产业生态的全球联动。



际开放合作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例如,新建5G-A基站5122个,累计建成1.8万个;新增智能算力3.8万P,算力总规模达到6万P。全市累计建成5家灯塔工厂、7家国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19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互联网医院119家,2025年互联网诊疗量261.6万人次,同比增长56.4%。

朱克力认为,世界数据组织把总部设在北京,是对其数字实力与开放姿态的国际认可,将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注入新动能,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带来多重战略机遇。

“北京可依托组织平台,在数据跨境流动、交易规则、安全治理等领域先行先试,将地方实践上升为国际共识,打造数据制度创新高地。同时,组织与北京数据集团、北数所等核心载体协同,推动数据交易、可信数据空间、公共数据开放等改革落地,加速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北京模式’,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经验,成为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核心引擎。”朱克力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强调,北京成为全球数据治理决策中心,还将吸引国际机构和跨国企业数据总部落地,强化“科技创新—产业转化—规则输出”的全球辐射能力。未来,北京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的资源和平台,可实现政策标准的国际对接、数据交易平台的国际化升级,以及产业生态的全球联动。其中,关键在于打通国内数据要素市场与全球规则的适配通道,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双向流动。

北京商报记者 程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涉及工业金融医疗14个行业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演进,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和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针对此次世界数据组织成立的时间点,世界数据组织理事长谭铁牛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强调,如何把数据潜能充分释放出来、驱动数字经济更快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也需要一个全球认可的国际平台来推动解决这些问题。

据了解,世界数据组织旨在弥合数据鸿沟、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以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促进数据在合规、安

全、可信前提下交流与利用,服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世界数据组织已吸纳超200个机构成为会员,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会员涵盖企业、高校与智库、国际组织、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涉及工业、金融、医疗、公共服务、电商零售、交通物流、能源、建筑、互联网、农业、教育、媒体、汽车、法律等14个行业。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数智未来科学院首席科学家朱克力表示,世界数据组织落地北京,是中国从数据大国迈向数据治理强国的里程碑,将深刻重塑数字发展格局。它标志着全球数据治理从西方单边主导转向多边共治,中国从规则追随者升级为共同制

定者与引领者,为维护数据主权、参与全球规则构建提供核心平台,显著提升在数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今年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世界数据组织的成立,将为我国数据要素价值的加速释放提供多重助力。”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进一步表示,首先是规则层面的统一,将打破数据要素流动的壁垒,让数据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高效配置,无论是国内不同区域之间,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数据要素的流通成本都将大幅降低;其次是能力建设的赋能,将间接推动中国数据技术的普惠共享,提升国内不同地区的数据利用能力,

让更多地区能参与到数据要素价值的创造中;此外,将促进全球数据领域的技术与经验碰撞,让更多数据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价值释放。

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添动能

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较2024年增长近六成。在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北京排名全球第二。

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辉此前介绍,2025年,北京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国

X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游资“失灵”是 资本市场的进化

董亮

近期,一则“游资大佬集体投降”的消息在资本市场引发热议。曾几何时,那些凭借“盘感”纵横市场的游资大鳄,如今却频频失手、节节败退。游资战法“失灵”表面看是“技术流”败给了“算法流”,实则是资本市场的一种进化。

游资依靠的是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以及交易经验,善于利用市场情绪套利,本质是一种极致投机。一有新概念出炉,游资便蜂拥而上,但它们盯上的从来不是新概念对应产业的长期发展前景,只是短期市场情绪下的套利空间。在游资的生存法则里,公司的基本面并不重要,它们只在乎拉高之后能否获利全身而退。

不可否认的是,游资对于活跃市场氛围、增加市场流动性有其积极意义。尤其在市场情绪低迷期,游资的交投行为对于提振市场信心也有一定的好处。

然而,游资战法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不看个股基本面,只看图形和概念,上市公司只被当做是一个投机赚钱的交易品种,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属性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游资助长了A股市场的投机风气,误导了一批投资者,让其误以为可以通过单纯的投机在资本市场获得暴利。部分投资者甚至彻底抛弃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转而去研究龙头战法、首板战法、跌停战法等技术流派,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在过去,游资之所以能够风光无限,与A股特有的投资者结构有很大关系。散户占比高、机构力量

弱,市场情绪容易大起大落,这给游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然而,时移世易。近年来,A股市场的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游资的“失灵”并非偶然,而是资本市场进化的一种必然。

游资点火,量化灭火。但败给量化,只是游资“失灵”的表面现象。从最初的柜台交易,再到电话下单、电脑交易,游资的操盘方式也在不断随着技术升级而改进,量化只是一种交易工具,并没有针对性。

随着各类中长期资金的持续入市,A股的投资者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构投资者占比稳步提升。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持续流入A股,它们看重的是企业的基本面,而不是短期的题材概念。

当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市场的定价逻辑也随之改变。一只股票能不能涨,不再取决于游资是否“看不上”,而取决于它的业绩是否扎实、估值是否合理。

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上市公司数量有序扩容,壳资源价值快速贬值。游资偏爱炒小、炒差,但注册制下这些股票的投资风险急剧上升,游资的“坐庄”战法已经变成了高风险、低收益的买卖。

高压监管之下,监管层严厉打击各类操纵市场行为,让游资那些打擦边球的玩法——虚假申报、对倒对敲、尾盘拉升,越来越玩不转。

实际上,并不是游资败给了量化,而是游资逐步被A股持续优化的新生态所淘汰。A股已经告别了大起大落阶段,游资转型价值投资是唯一选择。

银保渠道费用管控迎监管加码

3月30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金融监管总局人身保险监管司近日下发《关于加强银行代理渠道费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配套的《银行代理渠道费用管理有关事项问答(一)》(以下简称《问答一》),将“报行合一”合规管理纳入内部“担责”机制,如明确总经理要对“报行合一”整体工作负责。

当行业银保渠道保费增速一路狂奔,当“小账”乱象屡禁不止、罚单频出,这场此前已经开始的渠道费用透明化改革,正面临最关键的“压力测试”:费用管理的“篱笆”究竟还要扎多紧?那些隐藏在佣金、薪酬中的灰色操作,真的能被逐一“拆解”吗?在业内人士看来,一场针对银保渠道费用乱象的治理,正从“划红线”走向“堵暗门”的深水区。

明确各链条负责人

这份《通知》对保险公司提出了极为细致的要求:保险公司报送银行代理渠道产品备案,要按照人身保险产品智能核检系统要求,分别报送向银行支付的佣金、银保专员的薪酬激励、培训及客户服务费、分摊的固定费用等水平。保险公司开展银行代理渠道业务,要按照经备案的产品精算报告执行费用政策,发生费用支出应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凭证。

更为关键的是,从总部到基层,从精算到财务,“报行合一”合规管理责任链条被逐一压实。具体而言,保险公司董事会每年至少一次专题听取“报行合一”情况报告。总经理对“报行合一”工作负责,总精算师对产品设计负责,财务负责人对财务管理相关事项负责,分管银行代理渠道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银行代理渠道费用支出、业务推动活动开展真实性、合规性管理负责。各级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对相关分支机构“报行合一”工作负责。

与此同时,检查与通报双管齐下,违规的成本正在被拉高。根据《通知》,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开展“报行合一”现场检查,并建立违规问题和典型案例行业通报机制,及时向保险总公司及其法人机构监管部门通报相关情况。

《问答一》则进一步堵住了此前容易滋生灰色操作的“后门”。其中明确,保险公司不得要求或暗示银保专员将薪酬用于开展业务推动活动。保险公司要据实列支银保专员为提供银行代理渠道服务而垫付的费用,并计入培训及客户服务费,不得将相关款项以银保专员薪酬名

义发放。

保险公司要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将多渠道联合开展业务推动活动等发生的共同费用合理分摊至银行代理渠道,不得以不分摊或少分摊等方式向其他渠道转嫁费用。

众托帮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龙格对此表示,监管对薪酬提出这些要求,核心意图是堵住“后门”,让费用透明。具体来说:一是严禁公司用专员工资当“活动经费”,切断变相支付额外费用的通道;二是要求工作费用必须实报实销、单独记账,防止费用混淆作假;三是保护专员权益,确保他们拿到手的报酬是能自己支配的干净钱。总之,监管从薪酬下手,是为了让银保渠道的费用支出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旨在防四大风险

回溯来看,2023年8月,金融监管总局向多家人身险公司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代理渠道保险产品的通知》,对银行保险渠道佣金进行约束,也就是“报行合一”。

所谓“报行合一”,就是保险公司在实际销售产品时,手续费支付标准,必须和当初向监管部门报备产品时提交的标准完全一致。

自2023年“报行合一”推行以来,行业降本增效成果显著。2024年的行业统计数据,一年来,全行业相关渠道平均佣金水平较之前降低30%,费用精细化管理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银保渠道重返寿险“主力渠道”,近年来高速增长背后的隐忧持续浮现。费用虚列、恶性竞争等问题仍未根除,部分险企费用管理粗放

等乱象,扰乱市场秩序,也埋下了合规隐患。

此次《通知》的下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拧紧螺丝”。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首先,从行业背景看,此前银保合作虽已推行,但费用虚列、恶性竞争等问题仍存在,部分险企为抢渠道资源,存在佣金超报备、费用管理粗放等乱象,扰乱市场秩序,也埋下合规隐患,监管需通过细化规则堵住漏洞。其次,这是监管深化“报行合一”的关键举措,通过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检查,弥补前期执行短板,推动行业从规模导向转向合规经营。最后,从影响维度看,短期将倒逼险企重构费用体系,压缩违规操作空间,部分依赖高费用竞争的中小险企或面临渠道调整阵痛。长期则能净化市场生态,提升银保渠道经营质量,推动行业回归保障本源,为消费者提供更规范的保险服务。

那么,银保渠道为什么需要如此严格地执行“报行合一”?龙格分析指出,《通知》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和细化此前已有的监管要求,核心是狠抓“报行合一”,让保险公司报给监管的费用和实际花出去的钱必须完全一致。它的影响很直接:一是能强力整治市场通过支付“小账”“暗账”进行恶性竞争的老问题,拆掉灰色地带;二是能倒逼保险公司压缩不合理费用,真正实现降本增效;三是通过明确内部问责和强化外部检查,让违规成本变得极高,形成强大威慑。

“严格执行主要是为了防范四大风险。”龙格补充表示,一是财务风险,防止公司通过虚开发票、巧立名目等方式做假账,导致财务数据失真。二是经营风险,防止过高的渠道费用侵蚀公司利润,甚至通过抬高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损害客户利益。三是管理风险,避免费用分摊混乱、激励方案随意,造成内部管理失控。四是合规与腐败风险,杜绝通过“费用回流”等方式进行商业贿赂,保护销售人员权益,净化市场环境。

整体而言,银保渠道严格执行“报行合一”,核心是为根治渠道费用乱象,从源头规范费用支出,让渠道竞争回归产品与服务本身。同时,这也是防范经营风险的关键,高费用、虚列成本会侵蚀险企偿付能力,一旦市场波动,极易引发流动性风险,“报行合一”能夯实险企财务基础,保障稳健经营。

北京商报记者 胡永新